

历史的当下：遗产保护实践下近代史研究反思

Toward a Historical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Heritage Protection

冷天 | LENG Tian

摘要：历史的书写，从来都逃避不了时代的主观性；而所谓历史的真实，亦无法摆脱客体的相对性，因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表象，难以一窥全貌。本文重拾中国营造学社开启的，以实物和史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基于多个真实的遗产保护案例，通过建筑本体勘查、历史影像的三维数字化还原、特殊节点构造的拆解分析、实物湮灭后的类型化推测等工作，试图破解特殊的建筑结构体系及做法，揭示建筑物背后隐藏的历史和文化。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遗产保护实践中的探索与反思，不仅可以更好地叙述一段贴近真实的历史，同时，也构筑起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当下。

关键词：遗产保护、近代史、本体勘查、数字重建、类型研究

Abstract: The writing of history can never escape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imes. The so-called historical truth cannot dispense the relativity of the object, so it presents an intricate appearance and is much difficult to get a glimpse of the whole picture. This paper regains the research methods initiated by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which are mutually validated by material object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Based on several real heritage protection cas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xploration of architectural ontology, the three-dimensional digital restoration of historical images, the disassembly and analysis of special node structures, and the typification speculation after physical annihilation.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fold the special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system and practices, reveal the hidden history and culture behind. As Croce said, 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in the practice of heritage protection cannot only reconstruct a close to the real history, but also construct a sense of history permeating the present.

Keywords: Heritage protection, Modern history, Ontology exploration, Digital reconstruction, Typological study.

成立于 1930 年的中国营造学社，标志着中国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自己的古代建筑史研究之发轫。朱启钤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创刊首篇中，便明确地提出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并重的研究方法：“古人宫室制度之见于经史百家者，皆宜取证；并应注重实物。凡建筑所用，一椽一椽，乃至冢墓遗文，伽蓝旧迹，经考古学家、美术家、收藏家，所保存所记录者，尤当征作资料，希其援助。至古人界画粉本——实写真形，近代图样模型影片，皆拟设法访求。”^[1]随后，营造学社展开了大量的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走上了一条与乐嘉藻、佛格森（James Fergusson）、伊东忠太、关野

贞等东西学者截然不同的研究道路^[2]。营造学社当年的一张测绘工作照，记录下时任法式部主任的梁思成先生和文献部主任的刘敦桢先生，在这座千年古建遗存上共同工作的珍贵历史瞬间。这张照片也无声地见证着，筚路蓝缕的中国建筑先行者们，是如何克服重重障碍，将实物与史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融入为他们工作的点滴日常（图 1）。

在 20 世纪初期中西学术交融和新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之下，营造学社倡导的“研求实质之营造”的研究观念和方法，显然受到王国维先生提出的，运用地下的材料（考古）与纸上的材料（文献）相互印证比较的“二重证据法”之影响^[3]。西

作者：

冷天，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51578275)



图1：梁思成与刘敦桢测绘高颐墓阙，四川雅安，1939年



图2：南京大学“中山楼”，2016年

方类似的研究缘起于19世纪中叶，以维奥莱·勒·迪克（Eugene-Emmanuel Viollet-le-Duc）为代表的建筑师和学者，相继跨越了建筑历史和考古学的罅隙，形成了一种以考古学的方法来观察、分析现存建筑的研究方法，被称为“建筑考古学”（Architectural Archaeology，德语区称：Bauforschung）^[4]；通过对建筑遗存的精细测绘，关注构造细节与施工、改造痕迹，以揭示无载于历史文献的建造历史、改造历程甚至施工工艺^[5]。

中国建筑历史研究先行者的探索和西方跨学科理论的发展，已然揭示出对建筑实体本身进行系统性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然而，今日大部分中国城市中的历史建筑遗产之主体，并非营造学社当年所关注的传统建筑，而是那些距今并不遥远、体现出中西方建筑文化碰撞与交融特征的近代建筑。此外，这些近代建筑因各种社会、政治等原因，其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不可避免地存在封闭难觅和支离破碎的状况。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6]，几乎所有的史料都经过不同时代人们的转译和解释，因而带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所谓近史难修）。当下的快速城市化浪潮对历史遗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大部分研

究者的目光却仍停留在既有的传统史料之上，忽视了那些承载着丰厚历史信息的建筑遗存本身；许多快速落地的保护项目也因缺乏足够的实物研究支撑，而陷入程式化、表面化的巢窠。本文试图通过几个有代表性的遗产保护实践，通过建筑本体勘查、历史影像的三维数字化还原、特殊节点构造的拆解分析、实物湮灭后的类型化推测等不同研究，关注建筑的结构和构造，还原建筑的细节与工艺，进一步揭示建筑背后隐藏的特殊历史、文化和价值。

一、历史真实的复杂性

人类文明的进程，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因素的交织影响，而呈现出多元的复杂性。然而，传统史学观念试图发现某些规律性来解释和说明人类历史，形态纷繁、诡谲多变的历史真实，就可以被理论思维所把控，而不再是不可理喻的“偶然事件的堆积”。这种近代才产生并逐步占据强势地位的观念，严重依赖于简单性传统自然科学，今天的历史学界早已摒弃了以往宏大叙事的历史描述，更多强调碎片化的方式，从微观角度进行历史分析，强调真正的历史是个体的历史^[7]。虽然历史研究需要史实和史观并重，对于具体到个案的建筑遗产保护实践，更

多的需要厘清微观层面碎片化的真实，暗示出背后的历史体系、框架和观念。

在具体的遗产保护实践中，经常需要通过对各种历史文献、图纸等进行梳理考证，去追溯历史建筑早先的情况，为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础。然而，多重维度的历史真实，却随着各种碎片化信息的拼合，显露出普遍的复杂性特征。其中，坐落于南京大学北园内的一座小楼，便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图2）。

这座遍身涂抹黄色涂料、历经多轮改造的小楼，却以“中山楼”的名称，列为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孙穗芳女士^[8]在其回忆录中，提出此楼是“祖父就任临时大总统职时之官邸外观（南京）”^[9]，但此种说法未见任何其他史料可资佐证。同时，据总统府侍从队队长郭汉章的回忆录，明确指出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居住地点位于总统府西花园内一座中式小楼^[10]。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中，郭汉章作为亲历者的可靠性，显然超过晚于此事24年后才出生的孙穗芳。此外，孙穗芳称此楼为“官邸”的说法，准确性也难以使人信服^[11]。

放弃以孙中山为关键词的追踪路径，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周边的城市历史地段，可以发现这座楼正好处于金陵大学本部旧址和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前身之一）旧址

的中间位置，其周边至今仍保存有多座近代小型建筑，大部分都是当年金陵大学重要教职员的私人独立住宅。结合这座楼的建成年代（必定早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1912年之前），一个显然的推论因此昭然若揭：这座名为“中山楼”建筑的真实身份，极大可能也是金陵大学早期重要教职员住宅，其中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可能性最大。

大胆假设还需小心求证，在这个推测的引导下，研究的眼光转向金陵大学相关史料和档案。经过一番仔细地梳理，终于在一张校园局部规划图中^[12]，发现该建筑所处地块上标注的一行简短文字：“Mr. Bullock”，这座建筑真正主人的身份终于浮出水面^[13]。顺着这个具体的使用者姓氏线索，对文字类史料的追踪很快有了更多的收获。查阅金陵大学年度校长报告的财务记录，按年度檢視建设工程的实际花费，布洛克住宅主要建设时间被锁定在1910年8月9日^[14]至1911年末，校董会为此工程的实际投入约为5000墨西哥鹰洋^[15]。一张1911年绘制的地产勘测图上，完整地勾勒出这座建筑的轮廓，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上述的推测^[16]。

历史信息因年代的推移会不断堆积，建筑也在这个进程中被不同的使用者加以调适而产生变化，碎片化的历史真实需要仔细拼合方能展现历史之沿革。布洛克先生作为首任使用者，并未在这座建筑中居住很长的时间，孙中山先生或许只是这座建筑诸多访客中较为显赫的一员^[17]。根据耶鲁神学院图书馆藏金陵大学校务档案，在“教员宿舍十二号”的户主名录中，查阅出布洛克先生的继任者：胡默尔先生（William Frederick Hummel, 1884—1976）^[18]。他与妻子（Mildred Stuart Hummel）在南京成婚，育有四名子女，从

1917年5月至1927年3月，一直居住在这座建筑中，留下了大量与此相关的照片、信件和记录。这份珍贵的家族档案由胡默尔先生的后人捐出，现保存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其中大部分均经过数字化处理并在互联网上公开。逾百张黑白历史照片，清晰记录下当年精致的门窗、栏杆、柱廊、檐口等细部，还原了一个与现状迥然不同的美式住宅建筑之外观形象（图3）。

然而，如此丰富的史料和档案，也无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历史真实。绝大部分影像都着眼于拍摄建筑外观，与最重要之室内生活空间相关的却是寥寥无几。一张自入口门厅望向起居室和餐厅的照片，满眼尽是残破的沧桑，记录下1927年“南京事变”中该建筑遭遇的劫难，却给试图还原当年历史真实的努力，添加上更多的困惑和疑问（图4）。或许，历史潮汐之涨落是无可逃避的宿命，任何想通过史料还原完整历史真实的努力，最后都会止步于某个特定的位置难以前行。历史真实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建筑类遗产的历史真实因时间的推移，不仅显露出愈发碎片化的趋向，还因使用者的交替，呈现出一种多元的层叠式复杂性现象，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述之“层累形成的历史”。仍以这座建筑为例，在1927年“南京事变”后，金陵大学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回收教育主权的号召，拓展了教员工中的华人数量，类似“中山楼”这样的西方教员住宅，也在适当修缮改造后，成为中国教员的寓所。经查，在1927—1960年间，入住这座建筑的中国教员至少有下列三位：齐兆昌、李方训、余光烺。齐兆昌先生（Charles T. Gee）自之江大学毕业后赴美，入俄亥俄大学、密歇根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获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担任金陵大学工程处主任，主持设计建造了多个重要



图3：胡默尔家族档案中的“中山楼”东南侧外观历史照片，1920年代



图4：胡默尔家族档案中的“中山楼”“南京事变”后遭破坏之室内历史照片，1927年



图5：齐兆昌先生全家福，1935年摄于“中山楼”前院，左二为齐兆昌先生，前排右一为幼年的齐康先生



图6：南京大学赛珍珠故居，修缮前西立面剥除外粉刷后的单项问题分类研究图示，2011年



图7：南京大学赛珍珠故居，修缮后的西立面外观，2012年

建筑作品，如太平南路基督教圣保罗堂、西康路美国驻华大使馆、金陵大学小会堂等^[19]。李方训先生自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入西北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执教于金陵大学，成为著名物理化学家，1952年被任命为南京大学副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余光烺先生自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执教于金陵大学数学系，长期担任系主任工作，成为著名数学家。这三位不同领域著名人物相继入住“中山楼”的经历，给这座身世曲折的小建筑，增添上几道浓墨重彩之光辉的同时，也给相关历史研究者，提出了更多层次上的复杂性挑战（图5）。

二、建筑本体的拆解与勘察

胡默尔家族档案的发现，对“中山楼”而言无疑是极为珍贵和幸运的。然而，普遍存在的大量近代建筑遗存，由于多种历史或社会原因，其原始图纸、档案、照片等均已湮灭在历史车轮的回响声中，即便付出极大的耐心和努力，收获的可能仅仅只是只言片语，难以管窥蠡测全貌。此时，对建筑本体的拆解研究、现场各种历史痕迹的勘察研判，便成为下一步工作的基础和关键。

同样位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在进行史料文献的收集梳理时，就遇到了极大的障碍。研究团队付出极大的精力与代价，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搜罗海内外相关资料和信息，最终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其早先年代的图纸、文献记录，仅有的两张外观照片，也因报幅过小而模糊

难辨。为了厘清这座建筑内外的空间布局、结构体系、构造方式，在现场由施工队配合，谨慎地剥除了砖砌承重墙体外部的水泥粉饰，彻底揭示出本体的材料和做法。通过仔细的现场测绘，将实物照片与精细测绘相互叠合，梳理出各个立面存在的问题，按类型逐个分析研究并推理论证（图6）。

类似的研究也延伸到了建筑物的内部空间和做法之上，经过大量现场与案头相互对照的互动式分析研究，最终还原了三层美式上下推拉窗（内设平衡锤，附带纱窗和开合式百叶窗）、猫狗洞、传菜窗、地下水窖（Cistern，采集屋面雨水用作消防储水）、天然冰箱（1946年返校后由齐兆昌先生主持改造）、隐藏式推拉玻璃格门、木制瓜棱式门碰等。一座几乎没有史料文献支撑的近代建筑遗存，通过上述方法得到了较为妥善的保护和修缮（图7）。

另一个实例来自位于南京老城南三条营的蒋寿山故居。这是一组木框架结构体系的传统民居，从南至北共有7进，前面5进均为单层的门屋、厅堂（对外接待），最后两进为二层楼座（内部居住）。类似的清晚期民居建筑，在南京尚有多处遗存，虽然其空间和布局常随形制、用地、业主背景及偏好等变化，但在构造及细部上往往沿袭南京传统地域性做法，同一时期的建筑也因此保持着较为稳固的一致性。然而前期现场踏勘中，发现北侧两进楼座檐口两端的山墙部位，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做法：用四块薄青砖（两平两立），围合搭砌出一个半砖深的壁龛（图8）。因其所

处位置的特殊性，不由得使人怀疑，这些壁龛是否是当年有组织落水系统的一个残存？几个壁龛引发的推测，不仅与中国建筑自由落水的传统观念相矛盾，也无法在既往的研究或实例中，找到合理的解释与经验。本着存在必有其合理性的思考，在现场工匠的配合下，展开了进一步的拆解式探查：从壁龛内侧下方相同的位置打开墙体，一段陶制落水管旋即出现在眼前。这根隐藏在空斗砖墙内部的落水管，由多根陶制套管上下插接组成，上端承接檐口处的壁龛，下端通过一个隐蔽的砖砌水沟连接天井中的排水口，在中部二层楼面的位置，还巧妙地设计出一个内向的壁龛，方便楼上的使用者倒弃污水。整个内排水系统的设计简洁而巧妙，除了上部收水的檐沟因后期改造全部湮灭之外，其余各组成部分大都保存完好，不得不感叹当年工匠的细心与智慧。后期的修缮中，这些特



图8：蒋寿山故居修缮前，楼座檐口山墙处的壁龛，2010年



图9：蒋寿山故居修缮后，保留并修复的内排水系统，20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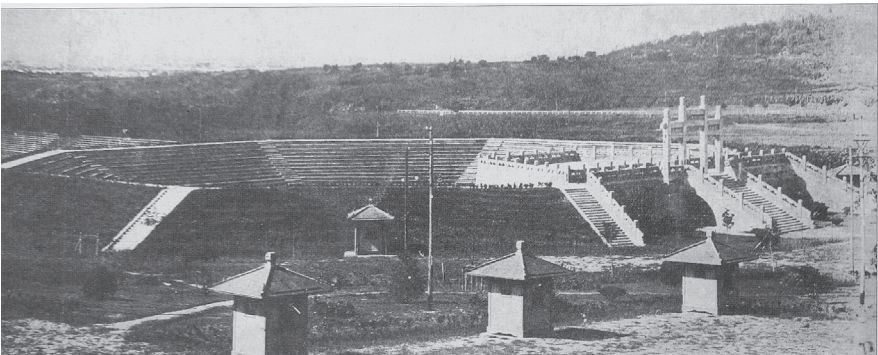


图10：国术场落成不久的历史照片，摄于1930年代初

殊的隐藏式内排水系统得到了完整的保留与整修，恢复并重现了它们原先收、汇雨水的功能（图9）。

三、建筑本体残损时的类型化研究

建筑遗产保护实践中所面对的大部分案例，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本体残损情况。即便采用前述的历史文献与实物调研相结合的方法，有时也无法还原残损部位的历史信息。这种情况下，扩大研究视野进行类型化的比较研究，寻找不同做法背后的普遍性规律，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突破。

位于南京东郊的中央体育场旧址，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体育场，也是远东地区规模最大、设施最为完备的运动场。整个中央体育场由杨廷宝先生领衔的基泰工程司设计，1931年2月奠基，利源建筑公司动用三千余名工人，仅用半年时间便将各项主体工程基本竣工，1933年顺利承办第五届全国运动会，2006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央体育场旧址建筑群中最为特殊的，是位于主田径场西南角的国术场。少年习武的杨廷宝先生，将暗含中国传统八卦图案的正八角形和武术竞技场地相融合，打造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国家级武术竞技场。国术场建成后，不仅见证了民国期间许多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也成为今天海峡两岸乃至国际范围内，武术界人士及

爱好者们共同的圣地。然而，由于多轮的战乱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经过数次改造（木工厂、网球场等），不仅界定基本空间格局的八角形内、外场及环道等早已被废弃并湮灭，复为后期大量蔓生的乔、灌木所重重遮蔽。

如何恢复并展示国术场原有之八角形空间格局，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其中的核心，是彻底摸清层叠状坐席看台的用材及做法。遍寻中央体育场七十多张原始设计蓝图^[20]，只有两张图纸明确标识国术场的项目名称。简明的剖面中仅标明了基本的坐席尺寸，没有额外的大样或索引。这其实是当年建筑工程施工图纸中的普遍现象，一些常规做法往往掌握在具体工匠手中，不需要建筑师在图纸上做出特殊标明。然而，当年的常规却成为今日的特殊，没有实物残存的指引，原始图纸也全无细节上的记载，完全无法想象这些曾经的观众坐席，当年的具体做法究竟是何种模样？（图10）

其实，把研究视野稍微拉宽一下，不难发现，观众坐席的设置及做法，是中央体育场各单体建筑物中都必须面临的普遍现象。随着这个思路，结合原始图纸、历史照片及现状遗存，按照类型学的方法，制作出一张涵盖主田径场、篮球场、网球场、棒球场、游泳池等单体内观众坐席的分类做法表（表1）。

根据表1，可以发现中央体育场旧址内，所有观众坐席分为两种做法：洋松木坐阶和预制缘

中央体育场旧址内各运动场观众坐席做法分析表				表 1
洋松木坐阶		预制缘石坐阶		
出现位置	特点	出现位置	特点	
田径场甲—丁类看台	下部有空间	田径场丙类	土质看台上	
	座椅边缘无倒角	游泳池看台	座椅边缘有倒角	
	有洋松木坐凳条和垫块	篮球场看台	无木坐凳条或垫块	
	部分有雨棚	棒球场看台	无雨棚	

石坐阶 (Precast Curbs)。洋松木坐阶出现在下部有建筑空间的混凝土屋面之上，如田径场甲～丁类看台；而缘石坐阶用于利用天然丘陵改造的夯土看台之上，如田径场丙类看台、游泳池、篮球场等。进而在原始图纸中找到了缘石坐阶的大样做法，所谓缘石坐阶，利用预制混凝土浇筑而成，截面呈“Z”形，集成了坐席、脚踏和集水沟，施工快速方便，上下层之间留有空隙方便雨水渗透（不致大量积水沿坐席下淌），还可分层抵抗土看台的侧向滑动，起到连续矮挡土墙的功效。上述类型化的研究，不仅揭示了不同种类观众坐席的分布规律，也找到了不同做法背后的功能、结构意义。至此，国术场已经湮灭的观众坐席之做法，按类型规律当属预制缘石坐阶无疑。

依据类型化研究完成的整体修缮方案顺利获得国家文物局的审批，正式施工前的探沟（国保级文物只有通过审批方可开挖）发掘出多块混凝土坐席残片，无论在材质还是做法上，完全证实了早先的推测。修缮后的国术场，层叠的混凝土缘石坐阶，还原出当年的八角空间形制，守护着这片见证了近代中国武术传承与发扬的净土（图 11）。

四、建筑本体与历史照片的三维数字化对照

建筑遗产保护实践中可以接触到的历史资料，除了设计图纸、文字档案、口述记录之外，最为常见的，莫过于历史照片了。近代时期随着摄影术的普及，大量历史照片记录下不同时期的城市、建筑、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今日回望历史最为重要的参考和依据。然而，绝大部分历史照片在精度、角度、视野等方面，不仅与今日之专业建筑摄影作品有着巨大的差别，更因为“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往往只能大致分辨出建筑物的外观样式，而无法精确测量建筑的比例与尺度。

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计算机能力的飞速发展，为历史影像的处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从多幅二维图像中计算三维特征，并使用计算机进行三维数字模型重构，已经是视觉和图形学领域较为成熟的技术，在文物修复和历史城市（村落）保护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这种技术的核心原理有两点：一是采集同一对象不同视角的多幅二维图像；二是使用计算机生成三维数字模型。利用不同角度二维图像之间的像素差值，自动生成矢量化立体模型，即所谓“照片建模” (Image-Based Modeling)。

然而，历史照片的数量非常有限，即便偶尔收集到两张以上，由于拍摄的器材不同（焦距、底幅等），上述“照片建模”的技术也难以适用，误差远远超出可以接受的程度。一旦理解到“照片建模”的关键在于同一对象的多个二维图像之对照，机会便随之出现。

在前述赛珍珠故居的前期研究中，通过对建筑局部的部分拆解，已经发现 5 根用于壁炉、锅炉、厨房用火的烟囱。可惜的是，这些烟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多轮维修改造中，凸出屋面的部分已经全部被拆除，以加强防水面的整体性，只能在一张像素很低的历史照片中，依稀看到它们当初的身影。仔细分析起来，这些

烟囱的平面尺寸完全可以在建筑本体中实测而得，外观式样在历史照片中也能基本厘清（需要辅助以青砖基本模数来推证），最为关键的缺失是各个烟囱的高度数据，而这一点似乎无法在历史照片中直接得出答案。

既然无法寻获更多的历史照片可资对照，那么，是否可以将历史照片跟建筑本体（实物遗存）进行对比呢？随即，一个基于现场精细测绘的三维数字模型，在电脑中构筑起来。将历史照片导入电脑，设立一个还原照片视角的虚拟照相机，仔细微调相机的焦距、位置、指向，将历史照片的基本轮廓尽可能准确地对准建筑物三维数字模型。此时，只需要拉伸或调整各个烟囱数字模型的高度与历史照片相符，便能够利用测量工具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值（图 12）。

通过这个方法，穿越过近一个世纪的时光，历史影像与实物遗存交叠于虚拟相机的取景框中，屋面上高低错落的五个烟囱相继得以恢复，赛珍珠故居终于以完整的历史形象，展现在参观者面前（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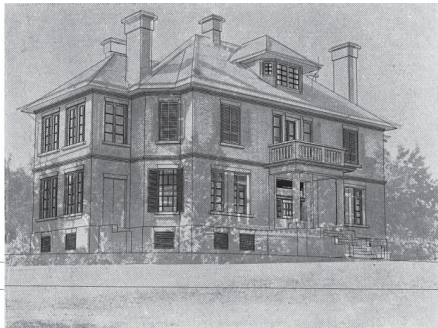
图 13：南京大学赛珍珠故居，修缮后的整体外观形象，2012 年



图 11：修缮后的国术场，2019 年



图 12：南京大学赛珍珠故居，基于数字化三维模型的建筑本体与历史照片之对照研究，2011 年



五、结语：历史的当下

1500年以来，随着大航海时代之开启和全球地理大发现，“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聚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21]，中国和西方文明自此开始了持续地、影响深远的交流和融合。在这个全球文明互动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也在建造模式、设计理念、材料技术等方面，潜移默化地吸取西方的优点和长处，走上一条与欧洲截然不同的近代转型道路。经过近百年的积累，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已取得长足的发展，近年来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亦显愈发蓬勃之态势。然而，受传统文化中“道器之辨”与“体用之分”的影响，建筑理论学界与遗产保护实践，一直未建立起紧密融合的互动关系。

当下快速城市化浪潮对历史遗产的剧烈冲击，敦促我们站在遗产保护实践的视角，通过建筑本体的拆解与勘查、残损构件的类型化研究、历史照片的三位数字化对照等多种方法，试图破解特殊的建筑结构体系及做法，挖掘不同建筑遗产背后承载的特殊历史文化意义，揭示史料文献背后隐藏的建筑师、工匠智慧。然而，正如克劳奇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说梁思成、刘敦桢等先行者们，在抗战期间筚路蓝缕地考察各类建筑遗存，其目的更多地在于破解中国传统建筑的语汇和文法，重拾那些逐渐消逝的历史；那么，今天的研究者应该跳出建筑本体修缮的技术性藩篱，站在国际文化视野下对中国近现代建筑价值进行重新判断，思考近现代建筑保护与更新在中国城市再发展中的空间与社会意义。“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22]。遗产保护实践

中的探索与反思，不仅可以叙述一段更贴近真实的历史，同时，也为未来构筑起一个更具历史感的当下。

注释

- [1]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M]. 第1卷第1册. 1930.
- [2] 王贵祥. 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之路[J]. 建筑学报, 2010, 1: 80-83.
- [3] 宁可. 从“二重证据法”说开去——漫谈历史研究与实物、文献、调查和实验的结合[J]. 文史哲, 2011, 6.
- [4] 刘怡涛, [比]高曼士, 张剑藏. 建筑考古学的体与用[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3.
- [5] 刘妍. Bauforschung: 历史建筑研究/建筑考古学[J]. Der Zug, Vol. 1.
- [6] [意]克罗齐著, 朱光潜译. 美学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1.
- [7] [法]弗朗索瓦多斯著, 马胜利译. 碎片化的历史学: 从《年鉴》到“新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2.
- [8] 孙穗芳系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的女儿, 1936年出生于上海。
- [9] [美]孙穗芳. 我的祖父孙中山[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5.
- [10] 郭汉章. 南京临时大总统府见闻实录[J]. 钟山风雨, 2003, 4.
- [11] 官员的府邸称官邸, 由公家提供的高级官员住宅, 并非私产.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 行程非常匆忙, 很难相信会由官方出面, 在离总统府约3km远的地方, 提前半年以上, 为孙中山修建专门的府邸。
- [12] LAYOUT OF LOTS, UNIVERSITY OF NANKING. 此图未注明年代, 现藏于南京大学档案馆。
- [13] 布洛克先生(Amasa Archibald Bullock, 1876-1950), 本科就读于加州伯克利大学农学专业, 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教育学。1909年偕妻子来南京, 创办金陵大学师范部(Normal Training)并任负责人, 后赴武昌任教, 1928年返美。
- [14] 在1910年8月9日校长报告中的房屋与修缮专项中提到: “我们很遗憾地报告, 因为至今未能得到合适的用地, 文怀恩先生和布洛克先生的房子还未动工。”(We are also sorry to report that Mr. Williams' and Mr. Bullock's houses have not yet been started, owing to failure to secure suitable land up to the present time.)
- [15] 金陵大学校长报告[P]. 1912年. 美国: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 [16] 金陵大学校园地产勘测图, 由美国建筑师阿尔德(A. E. Algar)绘制于1911年9月10日. 现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 [17] 布洛克先生次子(Theodore Holmes Bullock)在回忆录中提及: “我家保存的访客留名簿上, 有中国前总统孙中山及几位内阁成员的签名”。
- [18] 胡默尔先生是美以美会牧师, 金陵大学早期西方

教员, 主要教授英语、历史及宗教。

[19] 笔者曾就“中山楼”的情况当面求教于齐康先生(齐兆昌先生之子), 齐先生也深情地回忆起当年他父亲在楼内赶制工程图纸、就近照应监督金陵大学施工等往事。

[20] 图纸现藏于南京体育学院档案馆。

[21] [德]莱布尼茨著, [法]梅谦立, 杨保筠译. 中国近事[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07.

[22] 朱光潜. 克罗齐哲学评述, 欣概室逻辑学哲学散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09.

参考文献

- [1]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M]. 第1卷第1册. 1930.
- [2] 刘怡涛, [比]高曼士, 张剑藏. 建筑考古学的体与用[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3.
- [3] [意]克罗齐著, 朱光潜译. 美学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11.
- [4] [法]弗朗索瓦多斯著, 马胜利译. 碎片化的历史学: 从《年鉴》到“新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2.
- [5] [美]孙穗芳. 我的祖父孙中山[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05.
- [6] [德]莱布尼茨著, [法]梅谦立, 杨保筠译. 中国近事[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07.
- [7] 朱光潜. 克罗齐哲学评述, 欣概室逻辑学哲学散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09.
- [8] 王贵祥. 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之路[J]. 建筑学报, 2010, 1: 80-83.
- [9] 宁可. 从“二重证据法”说开去——漫谈历史研究与实物、文献、调查和实验的结合[J]. 文史哲, 2011, 6.
- [10] 刘妍. Bauforschung: 历史建筑研究/建筑考古学[J]. Der Zug, Vol. 1.
- [11] 郭汉章. 南京临时大总统府见闻实录. 钟山风雨[J]. 2003, 4.
- [12] 金陵大学校长报告[P]. 1912年. 美国: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图片来源

- 图1: 国家地理中文网
- 图2: 笔者自摄
- 图3, 图4: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 图5: 齐康先生提供
- 图6: 笔者自绘
- 图7, 图9, 图13: 侯博文摄
- 图8: 笔者自摄
- 图10: 东方杂志, 第30卷, 民国22年版
- 图11: 新华社<http://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5213219?from=singlemessage>
- 图12: 笔者自绘